

民族典籍翻译
研究丛书

王宏印 ◎ 主编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Oral Epic Manas

民族出版社

《玛纳斯》翻译 传播研究

梁真惠 ◎ 著

《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

梁真惠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 / 梁真惠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9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 / 王宏印主编)
ISBN 978-7-105-14001-5

I. ①玛… II. ①梁… III. ①《玛纳斯》—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0720号

《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

策划编辑	康厚桥
责任编辑	康厚桥
封面设计	金潇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1
定 价	32.00元
书 号	ISBN 978-7-105-14001-5/H·984(汉316)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史诗〈玛纳斯〉的翻译与传播研究》(12YJA740046)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玛纳斯〉综合研究》(13&ZD144)阶段性成果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

王宏印 ● 主编



民族典籍，昭彰世界

——朝着中华多民族文化翻译的宏伟目标迈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典籍在中华民族文化占有相当的分量，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在丰富的汉族汉语文化典籍之外，民族文学中的上古神话、英雄史诗、民间传说、小说诗歌，以及戏剧文学等，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和文学画面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这一丰富的遗产，如何继承和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以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点为依托，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从事中华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在，我们将这些成果整理成书，系统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为此，有必要就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作一基本的交代，以期和学界同仁共勉。

关于中华民族是多元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事实，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学术认识，是民族典籍翻译和研究的基点和起点。这一基本的认识，构成我们相关知识的基本领域和基本观点。中华民族是一个集合性的大民族概念，其中的各民族有不同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但都共同生活于中华民族的疆域和地理自然环境之内，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由此构成中国多民族长期生活的空

间与时间概念。中国各民族由于长期以来的发展和融合、征战与和亲，也包含了共同反对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寻求能够共同富裕昌盛之路的努力，在整体上，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完整概念，是无可争议的，是不容置疑的。

按照文化学的理解和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理解，中华各民族起源于不同人种，在发展中有其不同的民族因素的融合，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习俗等方面，有各自值得尊重的特点，不可强求一律。与之相关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化典籍，其中既包括对物质形态的文字描述，也包括精神形态的核心理念，例如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正是这些付诸语言文字的有形的精神文化传统，构成我们相互认识和相互交流的重要的认识依据和人文价值，而对于这些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和传播，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文化使命，是责无旁贷的，不可推卸的。

从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情况来看，构成民族文化典籍的东西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充满着智慧和多元文化价值。例如，世界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的原始先民的神话系统以及其中反映的原始先民心理的原型，稍后在民族迁徙和征战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英雄史诗以及所体现的民族大义和英雄精神，构成一种活态的表演性的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文学艺术形式。此外，大量的作为精神文化的行为化作品的舞蹈和音乐作品，也是一笔十分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适合纯粹的音乐的，而大部分则是有文字为载体的可以翻译的歌词和诗词作品，也许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挖掘和开拓的研究领域和翻译项目。

关于民族文学的研究，大体说来，可以有如下一些基本的思路选题范围：

1. 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和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搜集资料，探求线索，就民族文学和文化典籍作文本和版本的实证研究和考据研究，促进新资料的发现和发掘，或者针对新近发现的民族文学资料，做进一步的版本与文本的考据研究，在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寻求丰富和加深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和掌握的途径。

2. 引入新的语言学的研究机制，针对新的资料的发现和发掘，作详细的文本研究和意义的分析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可以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也可以用传统的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注释和疏解性的研究，旨在探究这些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且进一步作社会历史渊源与文化学艺术学的解释和说明，以丰富和加深对于这些文献的理解和掌握。

3. 引入翻译学和译介学研究方法，对民族文学文本进行翻译文本的对照研究、接受和传播研究，这里首先包括民族文本向其他民族文本的翻译，向汉语的翻译以及向外语的翻译研究。当然，反向的翻译研究也是可能的，那就是一个民族地区如何翻译外国语言文学、汉族语言文学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学成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翻译文学纳入本民族的文学史。不过，在目前的研究题目里，我们从事的主要是以民族文学的外译和汉译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其他方向的翻译研究，也有待于学界更多的关注。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研究课题的基本思路，我们将逐渐推出南开大学中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在博士生学位论文基础上的改写和完善项目，作为研究的专著予以出版发行。在研究范围上覆盖了大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的典籍翻译，在民族上则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彝族等的典籍翻译研究，在文类上包括了史传文学、英雄史诗、叙事诗和抒情诗等较为广泛的体裁。虽然我们的研究是初步的，题目是

有限的，但我们希望这样一批研究成果，会在某种意义上起到开拓和先行的作用，对国内外的民族文学翻译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中国当前的翻译学学科建设贡献自己一份独特的力量。

诚恳地欢迎学界同仁的批评与指导，欢迎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

愿朋友们携手并进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翻译格局而努力！

王宏印

2010年5月1日

南开大学寓所

极高明处致精微

——序梁真惠《〈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

“梁真惠，女，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比
较文化与翻译学、少数民族文学 / 文化翻译、译介学等。”一份极
为简洁的自我介绍，让我想到只有一面之缘的一位年轻学者。

当梁真惠捧着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来到我在母校西安外国语
大学（她目前的工作单位）的宾馆客厅落座时，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如此一位文弱女子怎么可以和规模宏大的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
联系到一起。回到天津，读完这部即将准备出版的《〈玛纳斯〉翻
译传播研究》专著时，我才相信她真的就是这部史诗及其翻译传播
的研究者。出于一种敬重和喜爱，我放下手头正在赶写的《中华民
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的稿子和序言，决定答应她的请求，利用赴
美国之前的紧迫时间，开始撰写这篇序言。

首先，当然是觉得，这部书稿放在我主编的“民族典籍翻译研
究”丛书中，当之无愧，而且可以为本丛书增色。同时还因为，这
使我想到，这套丛书的第一本《〈福乐智慧〉英译研究》的作者李宁，
我的博士生，都是来自新疆昌吉的，和梁真惠工作地点也相重合，
可谓是同乡。学术上有巧合，也许不完全出于偶然。

随着短信、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往来，我了解到梁真惠于1993年7月毕业于新疆伊犁师范学院外语系，曾在昌吉师专（现昌吉学院）外语系任教。2001年9月至2004年6月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获硕士学位。2009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师从郑海凌教授，研究史诗《玛纳斯》的翻译传播，并顺利通过答辩，毕业后调到我的母校西安外国语大学任教，主讲翻译史、翻译理论、文化翻译等课程。

她在2008年11月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西部项目”评审，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比较文学系翻译教学研究中心访学一年。其留学背景还是比较文学的背景，令我眼前一亮。迄今先后从事的5个科研项目，以及发表30余篇论文的成绩，使我相信，她是博士生中的佼佼者（2013年6月被评为北京市与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研究生），更是青年教师中科研成绩不俗的一位。

毫无疑问，梁真惠的新疆生活经历、川外和北京求学历程、海外留学生涯和广泛的研究领域，都是她选择研究史诗《玛纳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主持开题的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认为：“论文选题很有新意，很有学术性，跨越多种语文和民族国家界限，是典型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课题。作者占有了丰富的文献，并做了颇多的梳理工作。文章用了比较文献学的若干方法，在整体设计方面也具有可行性，可望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和学术成果，颇值得鼓励。”

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辜正坤教授的论文答辩评语如下：

作者从整理《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化过程、厘清各个唱本及其译本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该史诗的翻译传播史，清晰地勾勒出了《玛纳斯》史诗在我国及西方主要国家翻译传播的认知地图，很

有学术价值。作者还着重对《玛纳斯》的三个重要英译本进行了评析，揭示出史诗翻译过程中的三种不同样态与特点是如何受制于译者的翻译动机、文化身份、职业身份及时代背景的，很有说服力。

论文占有了颇为丰富的相关文献，结构合理，语言规范，逻辑性强。

导师郑海凌教授对于梁真惠的学位答辩申请，写了如下的肯定意见：

论文讨论民族史诗《玛纳斯》的翻译与传播，作者运用比较文化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探索史诗《玛纳斯》在英语世界翻译与传播的方式方法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该选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的难度。作者有机地融合了民俗学的民族志诗学、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理论、影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引入“活态”文学翻译领域，填补了《玛纳斯》史诗综合翻译研究的空白，这一思路对翻译学科的进一步拓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引用了如上的相关评价之后，我要谈一下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对这篇博士论文的总体印象，以及由此想到的有关民族典籍翻译及其国内翻译方向博士培养的一些问题：

1. 选题好，基础扎实

典籍翻译研究令人望而生畏，因为学外语的许多不谙古文，甚至对国学不感兴趣。说起民族典籍，更是无从下手，因为除了古文之外，还有民族语言，藏语、蒙古语、满语、彝语，更是畏若天书。可是曾几何时，中国文化典籍的选题方才开始，如今却成了热门，民族典籍也于近年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这些现象都值得深思。而北方三大民族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各有特点和难点，是比较生涩而难搞的选题。也就是说，它们有一定的知名

度，却有相当的难度，尤其在三部之间要做出选择，便会受到许多限制。其中的《格萨尔》为三种史诗之首，资料多，流传广，难以下手，在藏族文学和蒙古族文学之间，谁先谁后，欲断还连，有争议。好在已经有了王治国的研究，抢了先。而《江格尔》的资料，别的不说，只在翻译方面，又似乎还不够丰富和典型。这样，《玛纳斯》就是一个不错的甚至是必须的选题了。在选题上，梁真惠的新疆出身，四川经历，海外求学，于京华深造，都潜在地起了作用，但我更看重她的个人兴趣和坚持不懈的研究精神，认为这更加难得。研究的结果证明，这个选题不仅正当其时，而且适合她的条件和能力来完成。

2. 资料全，宽严得当

资料的占有，是选题是否成立、成熟和成功的根本。有不少人，凭空想象题目，没有资料，或者资料不足，只好放弃。又有些人，选的是大家都知道的题目，却因资料太多，堆积如山，无从下手，反成累赘。所以资料的占有是一回事，其难点在于国外的资料，有些不容易得到，而古老的资料，多半已经丧失。还有相关的资料，构成研究支撑的资料，却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些都是常常遇到的问题。对于外语类学术研究来说，个人语种的限制，往往影响甚大，尤其是第一、第二外语，民族语言、汉语水平，如果具备，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对于阅读和翻译，不仅是能不能得到的问题，更在于能不能掌握和利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玛纳斯》选题中都会遇到。可以说，梁真惠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除了个别海外珍稀资料，她基本上都得到了，而且会利用，也就是较好地解决了宽与窄的关系、博与精的关系，而且确定了研究的重点，不至于迷失在文山书海之间。换言之，她将三个英译本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既是比较的，又是个案的，既有类型，也有特质，还有可比性。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意识到《玛纳斯》庞大的资料和文本类型的复杂性，从而提出多元复杂性的翻译方式与完整性及时效性的传播限制。应当说

在同类研究报告中，这样既实事求是，又颇有见地的论断，体现了作者的研究眼光，学术品位。

3. 理论新，方法对头

近世以来，西学东渐，“形而上学猖獗”？新时期以来，建立翻译学，西方译论横行？如何对待，如何利用，是一个避不开的问题。可是，有的人忽视理论，不讲方法，缺乏眼光，毕竟进不了学术研究的门径。更有许多人带着理论的有色眼镜，手拿着成套理论的框子套路，不会应用，不会观察，不会分析，反而找不到选题；或者只能看到现成的选题，把前提当做结论，用理论绑架对象，肢解资料，得不出好的观点来。这是理论的悲哀，也是学术的悲哀。在史诗研究和民族文学研究领域，面对民族学和民俗学问题，人类学是大本营；在 21 世纪后现代语境下，地方性知识、差异伦理是纲要，而在翻译学领域，深度描述和深厚翻译是方法；面对“活态”史诗，仪式化、表演性和图像知识比书面文本更重要。研究者懂得这些理论，但并没有宣扬理论，拔高资料，无限上纲，而是认为对于《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这些理论，加上马克·本德尔的“三分法”，一概都不够，却针对史诗本体，从唱本开始，探求“文本化”过程，又着重三种文本的研究与比较，最后才提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要求和理想方案。这样一个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落实，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它体现的是研究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眼光，还需要一定的构思能力，暗含了康德的“综合判断”。

4. 背景明，正本清源

在涉及民族典籍的时候，由于牵涉面太广，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民俗的、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语言的等等因素，许多研究者准备不足，不得不避重就轻，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落得个虎头蛇尾，甚或有中途放弃的。可是阅读这篇论文，却不给人这种印象。在涉及史诗诞生和传播地域，柯尔克孜族这个跨国民族的起源发展、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

作者都有详细的交代和恰如其分的说明,显示出广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叙述能力。例如,要说清楚“安拉”和“上帝”的翻译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就必须了解其民族的宗教信仰,只知道萨满教、祖先崇拜、摩尼教等宗教信仰还不行,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异同方面,也要能做到见其大同,见其小异,才能辨析和判断,所谓“极高明处致精微”,其功夫正在于此。又如契丹与历史上的中国、大宁府与明代以后的北京,要能够面对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敏感问题,把它按照学术的思路加以解决,就需要历史地理学的知识,也需要合理的历史空间想象,还需要严谨的考据功夫,才能判明是非,有理有据。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甚至如何阅读和欣赏古代史诗作品的问题,恕不详陈。

5. 重点准,一体三面

现在有些人不会做研究,只会说理论。不知道研究新的现象就是研究对象,不懂得把现象“概念化”就是以理论眼光把握现实的开始,不重视个案和资料,不知道从材料里上升和总结观点就能形成结论,因此找不到研究题目,或者抱怨没有题目。这还是王国维那时候的老问题,即材料和观点的问题。在翻译研究中,遇到个案选择时,不知道应当选一个文本还是几个文本;有人认为没有比较就不能做研究了,但比较又不知道比较什么。其实,从梁真惠的《玛纳斯》的三个英译本的研究来看,就是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译本(三是最佳数字,优于两个对象的比较,容易扩大差异,而一是独木一根,难以下手,容易囫圇吞枣),进行描述然后加以归类,使其典型化,再加以命名,使其形成某种类型。当然,这种说法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和分类方法的扩展式应用,同时具有系列个案的性质。比如说,我的博士生吕敏宏关于葛浩文的翻译研究,便是选了萧红、莫言和朱天文的作品的译本进行研究,形成一个系列。当然,那三个文本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典型,形成了一条基本线索。我把这种研究叫

做“个案系列”或“系列个案”，比如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各自为政但又形成链条关系，或者构成战争的总图景；又如基督教神学上的“三位一体”，形成了其神学理论的核心结构，其余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三位一体”基础上的，可以视为核心的加深和扩展。

6. 评论精，分类得当

做学问的基本方法是定义和分类，所谓“分类得当”就是抓住了事物或对象的基本特点或者本质（21世纪已不大使用本质哲学的观点了）加以提升和典型化的过程，而且，也是命名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概念化的过程。对《玛纳斯》的三译本的研究，就有这样的特点：

三个英译本由于译者翻译取向、文化身份、职业身份的不同呈现出各自比较鲜明的特点：哈图的散体英译是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梅依的韵体诗歌翻译取向决定了其译本的文学特征，而阔曲姆库勒克孜的自由体诗歌翻译则突出了文化译本的特点。（论文《前言》）

当然这样的说法比较简略，甚至有目的论决定论的嫌疑，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分别命名为“学术译本”“文学译本”“文化译本”的同时，具体的研究和思路并没有束缚在这些概念中，而是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上，对三个译本进行了细腻的描写，使读者感觉到真实可信的研究成果，被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事实上，这种研究，是命名的，但也未必是概念先行，也许命名确定在具体的分析之后，是总结的结果。但是，显而易见，它不是概念分裂的结果（概念分裂一般是成对概念，有的基于语言的类推，有的基于辩证的巧思），更不是套用理论和成说（它们是季羨林所说的食洋不化，或者食古不化的结果）。毋宁说，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有分析基础的分类命名。一篇文章有了核心，就有了灵魂了。一如人体的五脏六腑，构成人体功能的基础，来接受头脑的统帅。五脏六腑是分析过程，而头脑

是命名机制。

7. 描写细，生动可感

典籍翻译这种课题带有翻译批评的性质，它是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的翻译研究，离不开原文和译文的对照分析，但是有些译者不喜欢这种研究，尤其不喜欢它的结果和结论。《红楼梦》的英译者霍克斯和翻译了中国现代当代小说五十多部的葛浩文，都公开表示害怕这种研究，葛浩文甚至说一想起来有学者研究他的译文就“浑身发抖”。多数译者也害怕别人把自己的译文和原文对照，尤其是害怕出原文译文对照本。但是文本研究是翻译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就像文学研究的文本细读一样，离开了文本只讲文化就讲不清楚，只讲译介学原理也讲不清楚。有的博士论文只见长篇大论的理论方法而不见研究对象，甚至看不出原本的特征和译本的概貌，研究的结论也避而不谈译本质量，只是流于列表画图提炼模式，热衷于传播路线，却始终找不到译文的影子。说实话，像梁真惠如此细致的文本分析，包括文化词语的注释，诗歌韵律、节奏和韵脚的讨论，以及序言、附录等的细节描写，就能给人以深刻印象。所谓描写译学和深度描写，其关键就在这里，它不仅要求译者的细致工作，即原本和译本本身充满内涵；也要求研究者的细致工作，将其中的东西挖掘出来，呈现出来——一如考古学，地下文物和考古发现，缺一不可。试想一下，一部小说缺乏精彩的细节描写，如何可以引人入胜？一幅绘画看不出引人的笔触色彩，如何可以叫观者流连忘返？一支乐曲没有引人的动机和一声勾人心魄的乐句，如何可以赢得满堂掌声？

8. 结构匀，动态平衡

史诗要靠结构，论文也要靠结构，没有结构和框架，就没有文学艺术作品，也就没有扎实的学位论文和研究专著。在史诗中，结构是一个叙述单元，而“程式结构”，则是和主题密切相关的整部史诗的叙事序列，“包括重复出现的主题或典型场景以及故事范

型在内的更大单元的程式结构”。从基本不变的程式结构到演唱过程中的变异性，构成一部史诗的流传样态和翻译赖以表现的艺术形式。论文在这个层面上解释史诗翻译，就抓到了史诗翻译的要点。另一方面，该论文的写作也表现出一定的结构，在绪论之后，从文本化过程到传播史构成第一个单元，从三个英译本的比较描述到跨学科研究视角则构成第二个单元，最后的结论与绪论呼应，完成整部论文的写作。应当说，这样的写作模式体现了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相一致的写作模式，也是一种马克思所赞赏的经典的写作模式，但同时还包含了史论结合的论述、宏观微观的结合、由简单到复杂的呈现过程，既适合论文写作思路，也符合阅读认知心理。甚至在全文行将结束的时候，还将最新的研究资料如数披露，将自己无暇顾及的资料，强调性地提出。须知这不是蛇足，而是精彩的一笔。暗示了研究视野的无限性，和对象世界的无限性一样，具有平行发展的性质。如此，则写作本身，就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为护短而强调其难，借强辞以夺学问之理。由此想到，按照思潮如风潮的习惯，“结构”一词似乎已经过时，因为“结构主义”被无情地“解构”了，似乎只有“解构主义”值得关注了。近读《德里达》传，只来得及领悟大师的博学和才思的敏捷，哪里找得到我们所理解的狭隘与偏执呢？

9. 文笔灵，和谐一致

文笔和文学，在中国古代，其实是一个概念，就是文章，就是写作，就是修辞学（包括了文字、语法和写作训练，甚至广义地包括了翻译）。一读来裕恂的《汉文典》，就明白了，原来中国的文章学，有本体论，不同于西方的修辞学，是一种“术”和“艺”。此书被南开大学出版社列为“20世纪初中国文章学名著”，详加注释，就是明证。古为今用，推而广之，所谓的文笔，起初指文学创作的文笔，其次指以之为基础的翻译译笔，再下来就是指论文写作和专著写作的文笔了。这些概念虽然有区别，但实际上是相继发生、相